

谈古论今

# “守正”的历史大逻辑

■靳全权

读史时常感困惑，为什么历史上不少坚守正道的人常常不能得志、难以善终，而一些醉心名利、没有操守的人，反倒顺风顺水？

比如屈原，他一生忠君爱民、正道直行，为了楚国的强大竭忠尽智、九死不悔，却连遭谗言陷害，被楚王疏远流放，最终心灰意冷投江而死；而公子兰、靳尚等人，阿谀奉承、奸佞卖国，却备受宠信重用。再如公子扶苏，他性情仁厚、素有贤名，却因政见而被秦始皇贬黜，后又遭胡亥、赵高等人陷害，守着忠孝之道自杀身亡；而昏庸无能的胡亥，却和赵高、李斯等人沆瀣一气，最终窃取了皇位。再如岳飞、林则徐等等，皆是坚守正道、忧国忧民之人，可结局甚是悲凉。

凡谈及此，往往令人心生疑窦：为什么坚守正道、厚德笃行之人，有时候反而难容于世，更难以实现抱负？是不是要有所成就，就必须学会圆滑世故，甚至舍弃原则、不择手段？如同屈原沉吟江畔时渔父所劝，“夫圣人者，不凝滞于物，而能与世推移。举世皆浊，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？众人皆醉，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醴？何故怀瑾握瑜，而自令见放为？”守正者困厄，奸巧者通达，历史规律真的是这样吗？如果我们深入思考，就会发现本质并非如此。

首先，并非所有坚守正道者都注定走向悲情。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的周公姬旦，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，直言犯谏、

坦荡无私的魏征……他们既持中守正，也建立了丰功伟绩。而从长远视之，历史上的奸邪之辈，恰恰注定不能得以善终。如邓通、贾似道、魏忠贤、和珅等人，虽曾显赫一时，最终却难逃身败名裂的下场。说到底，公道自在人心，得道多助、失道寡助，不行正道者，难以行之久远。

历史如大江滚滚东去，功名利禄只是过眼云烟。那些能经得住历史长河的淘洗、能为生命留下重量、能让后人景仰的，无疑是坚持操守、正道直行的人。也正是这些守正之人，构筑了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维度，托举起民族的精神脊梁。更何况，正道本来就不是求名索利的工具，不能以名利得失来评判守正之人。正道中不一定有千钟粟、黄金屋、颜如玉，但它定是一种崇高的价值追求，令人景仰。

守望正道，绝非易事。它需要我们涵养悲悯之心，如屈原一般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；需要我们胸怀豁达的得失观，像范仲淹一般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；需要我们有那么点傲骨和气节，像林则徐一般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。当然，坚守正道并非空讲原则、不讲方法，也不是一味苛刻、不能包容。以豁达的眼光看待事物，以灵活的方式处理难题，方能做到既乐于守正，又善于守正。

历史前行的轨迹总是曲曲折折、跌宕起伏，但纵览古今，它始终都在沿着一个方向奔涌，那就是正道。

## 最开放的唐朝

要说开放，历史上的中国，还是唐朝最开放。

唐朝的首都长安，是当时最繁荣开放的一个都城，是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。纵观历史，前后都难以有一座城市可以与之相比。一个时代如果国内混乱，统治秩序动摇，对内怕得不得了，这个时候对外来文化，一定会排斥拒绝。唐朝在强盛时，政治上有健全的宰相制度，敢于听取尖锐的“异见”，文化上张开双臂，接纳东西南北的各方文化使者和经济客商。王维的《送史》诗“南海商船来大食，西京袄寺建波斯，远人尽有如归乐，此是唐家全盛时”，可为写照。

当时各国人士，都争相来长安观光、旅游。唐太宗时，有康国（中亚古国，位于锡尔河至阿姆河之间）的人，献金桃银桃，种在皇家花园里面；唐玄宗时，又送来胡旋舞，连跳胡旋舞的舞女，一起送给唐朝。中亚的其它国家乃至大食国（阿拉伯帝国），也都送来马匹等礼物。这些使者按照他们的风俗，不拜也不跪，唐朝的皇帝照样很高兴。不像清朝，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，为了跪拜不跪拜，争论一个月。

当时长安还有很多外国贵族，因为各种原因前来，都受到唐朝政府的礼遇。他们在长安照样做官。不少人都融入中华文化之中，与唐朝的著名诗人往来相送，成为好友。有的外国贵族，在长安住久了，就娶唐朝女子为妻，落地生根，以华夏为故土。西域的安国有李抱玉、李抱真两兄弟，是唐朝有名的良将。还有一个叫朴球的新罗（古朝鲜）人，是唐朝的棋待诏，回去时，唐朝有官员写诗赠他，说：“海东谁敌手，归去道应孤。阙下传新势，船中覆旧图。”说你回去之后，应该没有敌手了。

日本一个叫晁衡的人，随遣唐使来留学，学成后留在长安做官，前后待了50年，与很多唐朝上层人士关系密切。天宝年间他归国，王维写诗送他：“乡树扶桑外，主人孤岛中。别离方异域，音信若为通。”晁衡的船遇到风险，民间误传他可能死了，李白写诗哭悼：“日本晁卿辞帝都，征帆一片绕蓬壶。明月不归沉碧海，白云愁色满苍梧。”可见双方友谊之深。

文化是相互影响的，唐朝文化远播外域，同时也受外域文化的影响。直到我们的很多乐器、生活用具、食物等，都带“胡”字，就是证明。野史笔记中有一种叫《东城老父传》，说当时的长安，唐人与胡人杂处，娶妻生子，致使“长安中少年，有胡心矣”。唐朝人佩戴的首饰靴服也不同往昔。唐宪宗元和年间，长安流行胡服，所以白居易的《时世妆》说当时女性是“斜红不晕赭面状”，把面孔涂成红褐色，像歌舞伎一样。白诗又说：“元和妆梳君记取，髻堆面赭非华风。”不仅面孔变了颜色，发式也奇形怪状，堆得高耸入云，摇摇欲坠，眉毛则画作低八字形。

唐朝的开放是全面的开放，是人心的充实，是社会的喜悦。但盛衰总是更替，当后来党争加剧，宫廷内斗到火拼的地步，唐朝的气象就黯淡下去。不过，即使是衰败的晚唐，文化照样发出微芒，诗人李商隐、杜牧、温庭筠也恰逢其时地出现了。只不知李白和杜甫会如何看待这些后来者的文学挣扎。

（摘自《环球人物》）

老照片

## 受西方影响的清末民初



杭州，基督教青年会。



天津，洋大夫给中国儿童看病。

（影像志）